

花地丛书

书梦录

姜德明



安徽人民出版社

1259/264

书 梦 录

姜 德 明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合 肥

责任编辑 徐子芳
封面设计 秦 龙

书 梦 录

姜德明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0 印张9 $\frac{7}{15}$ 字数160,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统一书号：10102.995 定价：0.75元

书 缘 (代序)

冯亦代

病中倍觉日长，原以为能假此空隙，还清文债，可是医生又下了禁令，只得以看书排遣。适姜德明寄来他的新作《书边草》，不啻沙漠跋涉，陡见绿洲，为之欢喜不尽。

德明爱书，广事搜罗“五四”以来的文学书刊，零本残籍，已经充塞小楼四壁。他是个有心人，不为书奴，每在编余披沙沥金，写成文章。不仅独具慧眼，发人所未发，而且为现代文学史添补不少资料。《书边草》便是这类文章的结集之一，我想后人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必将有所感谢于他。他为文流利婉约，清丽质朴，病中萎靡，览书顿失。

我久耳姜德明的大名，但订交却还是在十年梦觉之后。一九七八年仲夏得茅盾先生简，说德明提及我的旧作《书人书事》，他没见过，如我手头有，盼借他一读。以后送书去茅盾先生寓所时，才知道姜德明是当得起藏书家的称号的。从此，以《书人书事》为介，和他结下了翰墨之缘。

我也是喜欢买书的。从记事之日起，先是父祖的几只大书柜成了我课余的寄托，以后则节省下家里给的零用钱，一本一本往家里搬。但是说来也是命运多乖，一生浪迹江湖，迭遭噩运，三次藏书，三次散失。第一批是我当年在杭州老家的两大柜书刊。这是我在念中学时积累的，大部分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出版物，其中最珍贵的，是鲁迅先生在日本印行的《域外小说集》和一批《浙江潮》，以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和《未名丛刊》及创造社的初版书，以及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那时光华书局在杭州保佑坊开了爿分店，主持人是张静庐先生的侄子张鸿飞，所有的查禁书刊，都是他偷偷留给我的。一九三二年我到上海读大学，这些书便留在老家里，随着抗战军兴，杭州沦陷，这些书刊便无从复得了。以后借居香港三年，又收集了一批，书的种类则有中有西。虽逢太平洋事变，日据香港，人命难保，遑论身外之物。幸而我在一九四〇年初已到重庆，人与书均脱虎口。抗战结束后，我又乘友人包船之便，这些书得以顺流东下，略无损失。解放后来京参加工作，除了三百多本西文书，全部赠给外文出版社，帮助建立图书室外，历年庋藏，居然也有七千册之夥。不图五七年“扩大”，被勒令迁居两间加起来不足二十多平方米的斗室。一家四口锅炉盆罐都难以容纳，更不要讲六个书柜的书刊了。而且收入减少，我一向又是散漫惯的，这些书只能陆续变卖，吃到肚里去了。可是最令我伤心的，则是十年动乱之始的扫四旧，书籍也不能逃脱毁灭的下场。我曾经发誓今后决不再买一卷一册，可是梦觉后故态复

萌，如今又连地上也堆满了。人之偏执，其可怕处也就如此！

八〇年秋，苏晨自花城来，某夜同访德明，偶然在书丛中看到了一本施蛰存当年主编的《文饭小品》，书上却有我的名章，简直如睹故人，眼睛刹时变得模糊起来。德明要我在书上写几个字以留纪念，我迟迟未能动笔。也许我太痴，虽然知道这本书如今已落入一位珍爱书的人手里，可还是有种对不住“她”的心情。但是美人已属沙咤利，心痛也已晚了。于是就涂下几行字。文曰：

“一九八〇年八月与苏晨小坐德明书斋，德明出示书籍，偶见此册，则赫然当年旧物。此书随我多年，历经离乱，而得携来京华，实出意外。五七年罹奇祸后，为谋衣食，藏书尽散；不图今日复见，若逢故人，摩挲久之，不能或释；往事如烟，思之恍然。德明获此册于旧市，乃得幸存，赖其力焉。用志数语，道其经过。

八〇年九月廿日。”

最近听说吴晓铃也在书肆中买得我的一本旧物，可惜他已去美国讲学，来不及问他究竟是哪一本了。我想书籍如果只是我物，终后也将成为废纸，如此散失了，倒反而能广结书缘，未始不是一种幸福吧！

1982年4月



书边拾梦



目 录

书 缘(代序) 冯亦代

书边拾梦

鲁迅为工人的书写序	(1)
鲁迅与尚钺的《斧背》	(5)
鲁迅与官白羽	(9)
鲁迅与“国文学会”	(12)
鲁迅与“留经”运动	(15)
鲁迅与日本浮世绘	(18)
鲁迅与《城与年》之图	(26)
鲁迅这名字	(31)
大学生们的纪念	(34)
边疆的纪念	(37)
纪念鲁迅的歌	(39)
想起《鲁迅晚报》	(42)
附录:《鲁迅晚报》出版始末(金治 陈思)	(46)
茅盾的编辑艺术	(50)

注重附白	(53)
文坛消息	(56)
茅盾草拟抗战小说选目	(59)
茅盾与《华商报》的《灯塔》副刊	(63)
《见闻杂记》的本来面目	(71)
《郭沫若归国秘记》	(86)
郭沫若的归国与郁达夫的访日	(89)
关于殷尘其人	(95)
安娜夫人	(101)
四大家诗词集	(104)
作家的印象	(107)
林淡秋的《交响》	(109)
王统照的《题石集》	(111)
《炉边文谈》	(114)
钟敬文的散文	(117)
陆晶清的诗和散文	(120)
诗人于赓虞	(124)
卞之琳的木板新诗集	(127)
《水星》	(129)
《骆驼》和《骆驼草》	(132)
《光明》战时号外	(137)
周作人晚年书信	(139)
写土匪的书	(145)
《花萼》和《三叶》	(148)
《锦帆集》和《锦帆集外》	(151)
黄宗江的《卖艺人家》	(153)

《歌德之认识》	(156)
两本禁书	(159)
《世说新语》今安在?	(161)
《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	(163)
《石屋余津》和《石屋续津》	(165)
日本印王国维墨迹	(167)
纪念居里夫人	(169)
《狂言十番》小记	(171)
陈寅恪、张大千、敦煌学	(172)
《双清词草》	(175)
《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	(177)
消逝了的悲歌	(179)
许寿裳·经子渊·蔡元培	(182)
新浪的《路碑》	(187)
诗人的新浪	(190)
柳青的心	(193)
“日月楼”中的丰子恺	(196)
封面随想	(200)
序跋之类	(202)
书前题词	(204)
文末“赘言”	(206)
必要的附录	(208)
书上的广告	(210)
开本小说	(212)
作家签名本	(214)
文人卖书	(217)

幕外乱弹

《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	(219)
《梅兰芳游美记》	(221)
《予倩论剧》	(223)
《梅欧阁诗录》	(225)
作家的影评	(228)
夏衍的见识	(232)
呼唤着歌星的诞生	(235)
谐星之死	(237)
杜德夫的气质	(239)
论不说话的演员	(241)
荧光屏前	(243)
令人神往的“戏德”	(245)
飞吧，幸福的雁群！	(247)
木枪、风景及其他	(249)
卓别林的悲剧	(252)
安娜的出场	(257)
“欺骗”观众	(260)
以少胜多	(262)
不怕其烦	(264)
露与不露	(266)
后 记	(268)

鲁迅为工人的书写序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一本《苏联见闻录》。作者的名字很陌生，象个外国人名：林克多。这本360面的书，是经鲁迅先生校阅并作序的。

书的原稿一到了鲁迅先生的手里，便发现字写得很草率，但是，鲁迅还是蛮有兴趣地、费力地看了下去。他说：“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要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见《苏联见闻录·序》）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六日的《鲁迅日记》记载：“始为作者校阅《苏联见闻录》。”二十日记载：“夜作《见闻录》序。”二十二日又记载：“下午阅《苏联见闻录》毕。”鲁迅先生历来把校阅他人译著和撰写序跋，看作是自己文学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作起来是很紧张的。为了这部《苏联见闻录》，他几乎放弃了旁的工作，集中了一周的时间来校阅本书和写序言。他对这部书给予了热情的评价。

关于作者“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事，

在本书第一节“我为什么到苏联”里有说明。原来我们这位署名林克多的同胞，农民子弟出身，曾在国内中等工业专科学校毕业。一九二三年离开祖国，先在法国的里昂、巴黎、马赛等地当了六年的五金工人，原想积存点钱进学校深造，后因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他的美梦，他被工厂辞退，失业了。本来手中的积蓄还够回国的路费，偏巧又病了一阵，把四千法郎全部用光。看到苏联驻法公使在《人道报》上刊登招募五金工人的启事，他应征而往，于一九三〇年一月离别妻子马罗娅踏上征途。他的妻子是巴黎一位纺织女工。

应召首途的有四十名技术工人，除林克多以外，还有几名瑞士人，其余都是法国人。《苏联闻见录》便以他在巴黎出发写起。

作者写的都是他眼见的日常生活，朴实无华，几乎不发表什么议论，所以鲁迅先生说：“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象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为此，鲁迅含蓄地用了一个巧妙的评语，自己是“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市面上真实地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书很少，也是犯禁的。能够允许流通的少数几本，其中也夹杂着不少欺骗和毁誉，鲁迅正是有感而发。

作者介绍了一九三一年在红场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情形。游行队伍中，群众还举着各种标语、模型和讽刺口号，如：“打倒官僚主义分子”、“醉汉的误事”、

“资本家剥削工农的惨状”、“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等等，所有这些对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的读者来说，当然是异常新鲜的。

林克多因病又得以到外高加索疗养地去休养，这样他所写的见闻又不仅限于莫斯科一地。其中参观列宁格勒和巴库等地的记载，也都是不加修饰的文字，如同跟朋友聊天一样，是很吸引人的。

书中记录了他同苏联普通人民的交谈，好象也从报刊上收集了一些资料，介绍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前者生动，后者显然是来自间接的材料，所以鲁迅先生在序言中说：“中间遇到好象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

鲁迅对于本书不太满足的地方是：“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艰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正是鲁迅结合中国的现状而言的，因为他最担心中国的读者光顾了为别人叫好，却忘记了眼前的苦难，而象古代印度的寓言说的那样，要造高楼，却反对在平地上立柱子。尽管当事者说得多么热闹、美好，那离地而起的高楼终究会幻灭的。这也是鲁迅一贯的性格，他不唱高调，总是现实地、清醒地考虑问题。他比别人都想得要多一层，要深远一些。这种读书方法和观察问题的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

当然，指出这一缺点也并不是要求这位在海外当工人的林克多全部“负担起来”，所以鲁迅又实事求是地

指出：“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

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说，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黄岩人。据说后来他终于回国当了工程师。我又见到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大光书局印行的《苏联闻见录》的另一版本，现在连同光华书局的初版本当然都不易见到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杂志出版公司出版的“大时代丛书”之一《日本在华间谍网》，亦为林克多所编写。这是一本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后来在武汉又印过一版。看来很多内容都来自报刊上的有关材料。

1981年11月

鲁迅与尚钺的《斧背》

一九二六年，鲁迅先生在北平编的《乌合丛书》是专收创作的一套丛书。除了鲁迅的《呐喊》等，还有许钦文的《故乡》，以及冯沅君、高长虹、向培良的书，均由北新书局出版。本来还有尚钺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斧背》，已经由鲁迅先生编进了丛书，却为作者硬性索回。这本书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抹去“乌合丛书”的印迹，挂上“狂飙丛书第二第七种”的标号。尽管如此，鲁迅付出的劳动却是永在的。

关于本书的来龙去脉，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给韦素园的信中是涉及到了。先是鲁迅说高长虹狂妄地夸大自己对《莽原》的贡献，同时便讲到了《斧背》的作者突然收回原稿：“他们不知在玩什么圈套。今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尚钺的小说稿，原说要印入乌合丛书的。一天高歌忽而来取，说尚钺来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交给他了。后来长虹从上海来信，说‘高歌来信说你将尚钺的稿交还了他，不知何故?’我不复。一天，高歌来，抽出信来看，见了这话，问道，‘那么，拿一半

来，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这奇怪不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写公开信，并且没有向人说过。”鲁迅同青年作家的交往，也有一些颇不愉快的事，不过他往往不乐意向人念叨而已。

“狂飙”的高长虹、向培良先是从鲁迅那里得到过支持，转而大肆攻击培养和帮助过他们的鲁迅先生。青年时期的尚钺既然属于这个社团中人。为了行动一致，索回《斧背》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为环绕着《斧背》有这样一段故事，倒引起我很想看看《斧背》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

鲁迅先生以为尚钺是《莽原》社三位“中坚的小说作者”中的一个，认为他的创作态度还是比较严肃的。这本《斧背》共收小说十九篇，可以说是专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作者也很关心农村妇女们的命运，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礼教怎样残酷地迫害妇女，如集子里的《冲喜》、《节孝牌坊》、《假扮的客人》、《婢女》等便是。此外，《子与父》击刺了被城市所抛弃和歧视的农民们的绝望；《丁王大爷》等又描画出内地乡村的风物和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性格。总的说，我们早期的小说反映农村题材的不算太多，《斧背》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相隔十年左右，鲁迅先生于一九三五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小说二集时，他并没有忘记选收尚钺的作品。鲁迅从《斧背》中挑了一篇《子与父》，又挑了一篇《谁知道》。后者是从泰东书局出版的尚钺的短篇集《病》中选来的。这本《病》也是狂飙丛书中的一种，共收小说十六篇。